绪　论

几十年虎视鹰瞵

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同时确立了武力征服世界的路线。明治天皇在《宸翰》中，明确表达“：继承列祖列宗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决心用武力使日本成为“八纮一宇的大日本帝国”。① 八纮，是指天地的极限，日本就是要成为统治世界的大帝国。它的扩张政策首要目标是中国和朝鲜。1890 年，日本军阀头目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向明治天皇上奏的《外交政略论》提出“防守主权线，保护利益线”。什么是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什么是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地区是也。”他认为“今立于列国之际，仅仅防守主权线，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于形胜之地。”②“利益线”就是指朝鲜和中国。1894 年以侵华为宗旨的甲午中日战争，就是在保护利益线为由而发动起来的。这就是日本的大陆政策的开始。甲午战争，日本获胜，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日本得到许多利益，获得巨额赔款，霸占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控制了朝鲜。还获得在中国通商的许多特权。

日本在侵华甲午战争中得到很大利益，但是对中国虎视耽耽的列强还有的是。日本突然独吞辽东半岛，影响它们的侵华利益，

①② 《宸翰》（日本皇御笔信），〔日〕《明治文化全集》第二卷，第 33—34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沙俄就会同德、法两国进行干涉，那时日本的羽翼未丰，暂时退一步，迫使清政府拿出 3000 万两白银，赎还辽东半岛。而日本要侵夺中国东三省的企图没有稍减，加紧厉兵秣马，十年准备，1904 年，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发动了一场日俄战争。这场战争，沙俄惨败，沙俄在我国东北的特权让给日本。日本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与附约，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取得东北的一系列特权，在东北设立关东厅、关东军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前两者是日本在东北的政治、军事的侵略机构；“满铁”是兼有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综合性机构。

1927 年 4 月，日本军国主义头目田中义一大将上台。田中义一任日本首相兼外相后和外部政务次官森恪积极推行大陆政策，在日本东京和中国大连召开了一个“东方会议”。会议由首相亲自主持，参加人员除了田中内阁大多数军政要员外，还有日本有关满蒙事务之所有军政要员，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上海总领事矢田，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等。从参加会议的成员可以看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会议策划和制订了一整套侵略中国的“对华政策纲领”。这个纲领公开把中国的领土区分为“中国的本土与满蒙”，把中国的东北和蒙古从中国的本土分割出去。纲领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要使该地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对此，作为接壤邻邦之我国，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①。日本在纲领上不仅认定满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且居然以中国的主宰者自居，并确定了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扩大侵华的方针。后来，森

①《对华政策纲领》，〔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第 101—102 页。

恪毫不隐讳地说：“东方会议”的真正目的在于使满蒙脱离中国的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由日本来参与该地的主权。并由日本担任该地的治安工作。如果这样地露骨地说，可能招致麻烦，所以给它包了一层“东方会议”的糖衣。① 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早已把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他们的基本国策。

在东方会议之后，就有了一个田中义一向裕仁天皇的奏折，即《田中奏折》,这个奏折于 1929 年就传出了。这个奏折把侵略中国满蒙的用意写得十分明确。现援引几段：

“日本若不施行铁血政策，则不能消除东亚的困厄。但若施行‘铁血’政策，则必将与美国相抗衡……若要掌握控制中国的权柄，则必须击败美国……

然而,为征服中国,则必先征服满洲和蒙古。为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倘若能征服中国，则其余亚洲国家和南洋诸国均将畏我并向我投降……

我们如能掌握中国的全部资源，即能转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小亚、中亚,甚至欧洲。假若大和民族愿意在亚洲大陆有突出作为，同夺取对满洲和蒙古的控制权乃是第一步。’②

侵略中国东三省是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的第一步，这在日本军方一部分人中都是这样认定的。 1946 年 5 月开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东陆军省负责领导军务局的田中隆吉将军的证词，在回答‘满洲事变’是否预先策划好了这一问题时,明确地说“:是”。并且他还听过桥本欣五郎详细讲过全部情况，桥本特别肯定阴谋分子的目的是“把满洲变成能够开始振兴亚洲的基地”。大川周明同证人田中隆吉单独交谈时也肯定“满洲事变”是严格按计划进行的。而且他还说明，阴谋分子明白，利用满洲振兴亚洲的性质：“日

① 〔日〕今井清一:《太平洋战争史》。
② 《东京审判》,[苏]Л·Н·斯米尔诺夫等著，军事译文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第 6—7 页

本要成为亚洲各民族的领袖，要竭力摆脱白种人，从而使亚洲各民族获得解放。'①

由此可见，日本早已把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他们的基本国策，而侵占东北，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而是征服中国，征服亚洲，征服世界的第一步。

顺便谈一下关于《田中奏折》的问题。我国学术界在 70 年代中期以后，提出了这个奏折的真伪问题。有人认为《田中奏折》实际上不是真品的依据：一是没有见到原件；二是对这个东方会议之后的奏折，据现有史料考释，东方会议没有涉及到（侵吞全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等）全球性战略问题。

然而，《田中奏折》不仅是我们中国学术界是否确认的问题，而且是涉及国际和日本的一批当事人的态度问题。在 1946 年 9 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先要查清 20 年代后半期的事件。第一件事，就是提出《田中奏折》。在《东京审判》中记载：1946 年 9 月的一次庭审，“参加诉讼的各大国的联合公诉代表——达西先生在起诉发言阶段继续证明被告人犯有阴谋破坏和平的罪行，即犯有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他把一份编号为 169、被认为有罪的文件放在法官席上，当年这是一份绝密的重要文件，现在历史学家都知道那就是 1927 年 7 月 7 日的《田中奏折》。'② 在军事法庭上，达西宣读了这份奏折中的好几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中、苏、美、英、法、澳、荷、印、加、新、菲 11 国派出的法官组成，对日本主要战犯东条英机等 28 人进行了审判，有 300 名盟国代表、200 名日本代表和 200 名记者参加。战犯有辩护律师来施展本领。审判长达两年半。在这样的国际法庭上，没有一人提出过《田中奏折》非真品的问题。这份交法庭的《田中奏折》是原件还是抄件没有注明，但作为国际法庭上的重要罪

① 《东京审判》，第 21 页。
② 同上书，第 6 页。

证，非经过多少环节的验证是不可能公诸国际法庭的。作为审判日本主要战犯的国际法庭，地点又在东京，这是震撼日本统治者的头等大事。固然当时田中义一是死了，而裕仁天皇还在，对东京审判中的《田中奏折》，不是像对待某个个人发表一篇文章那样可以漠不关心，但是从天皇到被告席上的军政要员、辩护律师，都没有对《田中奏折》提过真伪的异议。至于说从日本所存资料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的《日本外务省档案》找不到史料根据。要知道，‘‘日本于 1945 年 8 月 14 日同意无条件投降，但直到 8 月 30 日美国第一批空降部队才开始在东京着陆。在这 16 天内，东京保全下来的政府大厦顶上浓烟滚滚，这是在烧毁无数的、各种各样的绝密文件 ”。① 何况提出考证异议的，并没有查阅东京审判的档案。

对于东方会议没有查考到涉及田中义一的全球性战略而存疑的问题。其实，东方会议主要是具体确定怎样侵占“ 满蒙 ”的步骤、措施，而《田中奏折》讲的是为什么要侵占中国的满蒙的道理。田中义一对新登基的裕仁天皇，需要把建立“ 八纮一宇的大日本帝国 ”的思想细细说明。对天皇讲明侵占满蒙的道理，对下属拟定侵占满蒙的步骤、措施，这是互相呼应的上下篇。

田中的计划，一手是对蒋介石，一手是对东北的张作霖。对蒋介石是要他不插手北方， 1927 年春田中与蒋介石会晤，双方认同反共之后，在统一中国问题上僵持了，田中要把蒋介石的势力限制在南方，消除中国的共产主义，实现日本侵占东北，控制江北。蒋介石要北伐，统一中国。为此，田中内阁三次出兵侵略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武力警告蒋介石。最后在蒋介石保证‘ 北伐 ’不出关；‘ 统一 ”不反日，默认东北任日本处置的条件下，日本承认蒋介石的北伐。

对付张作霖；‘ 东方会议 ’的具体措施是‘ 满蒙 ’问题的根本解决要从处置张作霖开始；张作霖军队如从关内败退，必须采取断然

①《东京审判》，第 13—14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措施解除其武装；同时由驻北京的日本公使发表声明，反对并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1928 年 4 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进攻奉军，张作霖兵败。日方为夺满洲而提出三种方案对付张作霖，一种是解除奉军武装，张作霖下台，换个更听话的；一种是杀掉张作霖；还有一种是日本用武力威胁，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成为日本武力胁持下的驯服傀儡。而张作霖不想轻易撤回东北，遣密使去南京议和，又转而拉拢英、美，重金聘美国军事顾问，希望与美国合作修建铁路。张与英、美亲近，日本敌视，于是炸死了张作霖。可是东北未因张作霖死而发生动乱，相反促进了东北的“易帜”和蒋介石的“统一”。此时占领东北的计划未成。

田中义一侵占东北的实施步骤失败，与《田中奏折》征服中国、征服亚洲、征服世界的距离拉大了。1929 年，田中因统治集团内的矛盾并遭天皇斥责而辞职，不久身亡。

田中侵占东北的实施计划流产和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加深了日本统治集团的分裂。侵略中国满蒙本是统治者一致的意图，几代天皇，历届内阁、历任军部都是一以贯之。然而在行动步骤上，一派是以军事行动、武力入侵为根本的唯一的手段，武装占领就是一切，只要既成事实，政治、外交、国际舆论都可改变。一派是既要军事，又要顾及外交、政治。前者主要是军方。1929 年 5 月，关东军“情报会议”作出结论：张作霖死后，日本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之外，别无选择。因此，有必要彻底研究“全面的军事行动”。① 自此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已准备好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整套武力侵占我国东北的方案。

1929 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1930 年危机袭击到日本，1931 年是日本经济危机达到高峰的一年。日本政党

① 〔日〕稻叶正夫《中国·北伐完成——日本·满洲事变的序曲》，《昭和三年中国事变出兵史》，转引自 1990 年第 2 期《档案与历史》，沈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政策形成的真相》。

内阁一筹莫展，加之政党官僚贪污受贿成风，引起国民不满。于是，日本军部企图用‘改造国家’的法西斯运动，结束政党政治，建立军人独裁，维护天皇制国家，搞军事政变、暗杀和发动侵华战争。日本政党政治与军部的矛盾加深。为了摆脱国内经济、政治的危机，在侵华战争上，有其一致性，但具体问题的处置上有所差异。政党政治在摇摇欲坠的形势下，想控制军方，但是政党内阁如走马灯那样更换，首相接连被刺。

日军侵占东北

日本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官僚机构的腐败，政党政治摇摇欲坠，政局动荡。军国主义分子日渐猖獗，组织暴乱，要解散议会，取缔政党，使日本在军人统治下“显扬皇威”。日本国内一步步加紧实现军国主义化；对外，加速侵略中国的步骤。 1930 年，日本把炮兵调到满洲，占据了若干中国军队营区对面的战略高地。军方的观点是：加强兵力，把中国军队赶出满洲，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新政权。

到 1931 年，侵占中国东北的意图具体化了。这年 4 月，日本参谋部讨论了侵占我东北的计划。提出侵略方案建议的是参谋部二部部长桥本欣五郎大佐，和他一唱一和的有大川周明，他竭力鼓吹日本要成亚洲的领袖，在亚洲建立起受日本庇护的遵循“王道”原则的国家。大川是在东北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裁，是为日本将军们欢迎的人，经常到参谋部讲授军国主义，扩张主义、种族主义之道。积极参与，决定计划的有陆相南次郎以及东条英机（1941 年至 1944 年任首相），参谋部军务局局长田中隆吉和他的幕僚；在关东军方面有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关东军谍报队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在宫廷方面，支持桥本、大川计划的有天皇的顾问木户幸一侯爵，近卫文麿公爵(几次出任首相)等，在政

府部门中，也有一些官员，如外务省亚洲司司长同田荷等。

1931 年 8 月初，专门成立了“满蒙问题调查团”，负责人就是桥本大佐。这个名为调查团，实是部署侵略行动的阴谋，被赋予行动的特权。木户幸一侯爵在 1931 年 8 月 7 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成立了满蒙问题调查团，负责人是桥本大佐和重藤大佐。军队首脑不妨碍该组织，因为桥本他们自己正在谋划这类阴谋活动。”①

为了煽动战争情绪，大川周明在侵占东北前的两年中在全日本作满洲问题的演说几百次。另则通过在东北制造事端，然后颠倒黑白在报纸上竭力煽动侵华。

1931 年 9 月 15 日，在侵华的许多准备基本就绪后，于东京召开了日本军事首脑会议，作出部署。

由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踏上第二次世界大战途程的重要一步，而侵略的开场又是阴谋制造事端，日本要把军事行动的起因与责任推到中国军队身上，以及推到关东军一些军官“非法妄为”所造成的等等，那么必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是日本最高层的决策。

东京的决策，就要在东北体现出来。在东北各地肇事甚多，正如日本领馆所说“目下满洲各地中日不祥事件迭出”。1931 年 4 月开始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万宝山位于吉林省长春县三区境内。日方支持汉奸郝永德办长农稻田公司，招朝鲜侨民 200 余人，强挖当地 200 来户农户土地百余垧，引起纠纷。当地县政府派警察制止，可是日本领事以及日租界警察和军队相继加入，支持朝鲜侨民继续挖地，接通伊通河。这 3 丈宽，20 余里长的沟壑挖通，将使千余垧土地处在水淹的威胁下。7 月 2 日，万宝山农民集合，回复河沟原状。日本警察开枪，射击 38 弹。农民愤极，欲夺枪支，被县警署

①《东京审判》，第 29 页。

劝阻。强挖的沟、堤坝,由日本警察梭巡。日方就开始造谣,说中国压迫朝鲜侨民,尤其在朝鲜,利用报纸,大造谣言,掀起排华风潮。平壤、汉城、仁川、釜山等地尤为激烈,许多侨胞开的商店,被焚被砸被掠,到7月底旅朝侨胞 126 人惨遭杀戮。

朝鲜争取独立的组织以新政府的名义向各处朝鲜人民发出通电,表示各地中朝人民冲突,纯系日本帝国主义从中蛊惑离间所致,尤以朝鲜人举动均为日方所唆使,现这种欲罢不能的情况,皆属日方造成此恶化的局面。所有现在未经波及的各地朝鲜人民,万不可轻易造次,以免失却中朝两方固有的好感。可是日本却千方百计尽其挑拨之能事,在哈尔滨领馆,密议各种挑拨渲染的办法。在中朝人民杂居地区,将中朝儿童的玩殴,都夸大到华人袭击朝人,并说乘机寻殴日本人。排华风潮不能止,在朝侨胞逃离回国的逾三分之一,财产损失仅平壤一地就达日金 256 万元。

另一事件就是"中村大尉事件"。1931 年 6 月 25 日,在我国边防军事要地兴安岭地区抓获了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等 4 人,搜出中、日方军用地图各一张,上面用铅笔勾改,另有兴安屯垦区中国驻军的兵力、装备、驻屯地点、将校姓名、后勤供应等详细军事情报,蒙旗的人口、物产、森林、矿藏以及地方风土人情。中村是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员。证据确凿,兴安屯垦军第 3 团以中村等构成间谍罪将 4 人处死。日本在 8 月公布中村大尉被中国军队所害,谎称中村是观察中国开垦和铁路情况以及贩卖海洛因。被搜出之物为手枪一支、药品和金票、书信。完全隐去谍报的罪行。借中村死,在日本和朝鲜大规模鼓吹武力解决。日本报纸议论激昂,达于沸点。

从 7 月到 9 月,日本借"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进行排华、反华和战争煽动到了狂热程度。发动侵略战争的先导工作已经就绪,武装侵略就随之而来。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经过精心策划,制造了"柳条

湖事件”,随即向我大举进攻,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柳条湖位于沈阳城北郊南满铁路附近，距东北军北大营很近。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率领数人，在预定的柳条湖东侧南满铁路上进行引爆，炸毁了一段铁轨和两根枕木，随即布置了一个假现场，在路轨旁摆出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接着，日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向我北大营发动进攻。日驻奉天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在柳条湖现场事端制造完毕，即向坐镇旅顺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报告说：“18日午后10时30分,兵力约三、四个连的中国正规军，炸毁北大营西南方南满铁道。驻虎石台中队已开始对其进行攻击。奉天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正开往现场。”本庄繁认为一切准备就绪,于19日凌晨1时20分至2时用电报分别给各部队下达迅速向奉天集中的命令。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稍有抗击，掩护队伍撤退。凌晨5时30分日军占领了北大营。日军继而进攻沈阳。沈阳只有公安局长黄显声率领的公安队不执行“不抵抗”令起来抵抗，但由于力量悬殊，力不能支而退走。一夜之间，日军占领整个沈阳城。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制炮厂和飞机厂等军工厂全部落入日军手中。据统计，那里有飞机262架,迫击炮等各种火炮3091门,战车26辆,步枪和手枪118206支,机关枪5864挺。① 第二天日军占领了长春等地。21日占领吉林。仅仅一周时间残暴的日本关东军已攻占我东北大小城市30座,②,控制铁路线12条③辽宁、吉林两行省

①陈觉：《九·一八国难痛史资料》第一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11月版,第52—88页。

②日军一周内先后占领的城市有：沈阳、长春、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湖、抚顺、沟帮子、熊岳城、吉林、通辽、郑家屯、牛庄、敦化、蛟河、巨流河、新民、洮南等30座城市。

③ 日军一周内先后控制的铁路线有:南满、安奉、北宁、中东、沈海、四洮、吉长、吉敦、大通、洮昂、吉海、营沟等12条铁路线。

的千里江山即沦于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第二年 1 月 3 日日军又攻占了锦州，2 月 5 日攻占了哈尔滨。这样，就在事变发生后的 4 个月零 18 天的时间内占领了我东北三省和一个特区，使东北 3000 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当时可悲的情景正如后来在民间流传的小调中悲愤地申诉的那样："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面对日本侵华的国共两党

一个国家要有大的行动，必然有舆论为先导。日本侵华战争宣传是早已开始了。只要稍加注意日本的舆论，就可以觉察到侵华战争危在旦夕。《顾维钧回忆录》谈当时在野的顾维钧预感日本入侵之战争时说："1931 年夏天我在北戴河时，对于日本情况感到不安。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情报，但报纸上发表的东西已把满洲局势的发展充分告诉了我。日本政府一直紧逼的所谓中日三百件悬案，多数都发生在满洲或与华北有关，而满洲各省和华北，全在少帅统治之下。7 月中旬，我在北戴河看到来自日本的新闻报道，谈到有关日本政府，特别是军事当局的部署，相当激荡人心。……我担心如果日本这次采取行动，可能要成为严重事件。……大致可从所有消息来判断，日本人这次也许会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我怕很可能日本人这次要采取军事行动。"①

既然从日本报纸就可以觉察，作为政府怎么能毫无觉察呢？问题在于蒋介石早就确定了媚日、不抵抗的政策。就在日本东方会议后不久的 1927 年 11 月 5 日，蒋介石在日本同田中义一会谈时表示："'日本有必要帮助我们的同志，早日完成革命，排除国民的误

①《顾维钧回忆录 1》,中华书局 1983 年 5月版,第 412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解。如果真能如此,满蒙问题也容易解决。’还说“:现在和中国打交道的列强虽然为数不少，但确有紧密的利害关系的不过日苏两国。苏联在这种理由下，对中国已经有所干涉，日本为什么没有理由可以进行干涉和援助呢？作为革命党人的我，讲这种话，必然招致国人的愤怒，被人看做是卖国贼，但因为阁下是我信赖的前辈，所以才向阁下披衷情。’,① 这就是蒋介石同日本政府的默契。要日本来干涉中国内政，只要援蒋，满蒙问题可以容忍日本处置。

1928 年 5 月，日军侵占济南，制造济南惨案。蒋介石却要中国人民‘忍辱负重”,训令部属“:(一)不与日军构争,保护侨民……(二)对于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三)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四)若遇有事时,日本要求枪支,即以枪支与之 要捕作俘虏,即听其捕作俘虏。’②

尽管蒋介石在 1928 年 7 月表示过对日的稍为强硬的态度，7 月 19 日，南京国民政府向日本驻北京公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终止到期的于 1896 年签订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但这是在‘济南惨案”后，中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对日经济抵制运动遍及中国各地的情况下所作的姿态。事实上，这年 9 月底,蒋介石就派遣他的私人特使赴东京，表示愿意着手讨论中日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的种种寻衅，频繁的军事演习，沈阳形势紧张，蒋介石政府不仅毫无准备，反而一再严令张学良不作任何抵抗。当张学良因辽宁形势吃紧而派人赴南京请示，蒋介石说“: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③7 月 12 日,蒋又密电张学良，勿生事端。

①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第 105—106 页。
② 荣孟源:《蒋家王朝》,第 42—43 页。转引自《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蒋介石和张学良》,《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版,1991 年 6 月。
③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6 辑,第 9 页。

8月 16 日,由于“中村事件”蒋介石给张学良发出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切遵照执行。”①

9月 12 日，蒋介石邀张学良在石家庄车站的专列里秘密会晤。蒋介石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②

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把不抵抗主义转告东北各军一体遵照执行,并电令重申“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③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还层层下达，据东北军一军官事后回忆说：“上级口头指示‘如果日军向我们进攻进时,不要抵抗,要什么给什么 如果日军向我们挑衅，我们可以躲出营房，日军看到我们驻地无人，他们自然就走了，等他们走了，我们再回来；如果日军侵占我们领土,我们就报告国联,国联自然会出来主持公道,迫使日军撤兵。’上级害怕日军进攻时中国军队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抵抗，所以枪支不发子弹。”④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政策在东北军内层层下达贯彻，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武装进攻时，东北军内的爱国官兵已无法抵制敌人的入侵，结果断送了东北大好河山。

当日军向我北大营和沈阳发动进攻时，张学良正在北平养病，

①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6 辑,第 9 页
② 同上,第 26 页
③ 《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1 页。
④ 郑殿起:《我对“九·一八”的片断回忆》

张接到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司令代理长官荣臻的报告后，即召集在北平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张学良表明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并决定速报中央听候指示。那时,蒋介石正指挥大军在江西“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蒋介石接到报告后，立即返回南京商讨对策。

9月21日，蒋在陵园召集党政首长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外交委员会”负责制定对日外交的决策。这个决策就是向‘国际联盟’起诉,听凭国际联盟处置。外交部长王正廷发表对日外交方针时说：“吾人深信国联会为主张国际公道，并维持世界和平之机关，故已将详情电达日内瓦本国代表，想联会方面当能处理此事。”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员大会上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蒋介石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全国上下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一律不准抵抗，一切依赖国联解决。9月21日，蒋介石发表第一篇政策声明《告全国军民书》提出“信任国联之公理处断”,23日《国民政府告民众书》重申‘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至对于在华日侨，政府亦严令各地方官吏妥慎保护……”'①

一个国家在列强重兵侵略之下，自己命令束手挨打，却去指望都是侵略弱小民族、也都有侵华历史的列强操纵的国联来裁决日本撤出东北，是何等的荒唐！即使有所决议，又怎能为日本所接受呢？在特别外交委员会就有人提出：“要日本遵守国联行政院的决议是不可能的。按照国联盟约组成的行政院，无权强制实行它的决议。’② 而蒋介石置若罔闻。

① 《新闻报》,1931年9月24日。
② 《顾维钧回忆录（1）》,第416页。

蒋介石坚持不抵抗主义的根据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在外长顾维钧举行宣誓就职时发表的演说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① 既不能战,也不能言和,既不能用军事,又不能靠外交,那就是任凭侵占我国土地。

国民党政府对日军侵略是束手挨打的不抵抗政策，对人民的救国行动则是采取压制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民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开展,其中最能击到日本侵略者痛处的是对日经济绝交。据当时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日货输入我国每年达 4 亿余元之钜。再加在华日厂每年所产的棉纱、棉布达 2 亿余元。仅两项合计就达 6 亿余元。一个“不穿日货,不吃日货,不用日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全市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使日本侵略者大受震惊。 9 月 20 日起,日本海军陆战队和部分日侨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一带示威、挑衅，捣毁中国商店，撕毁抗日标语，并与上海市民发生严重冲突。使北四川路一带的中国商店无法正常营业，店主和职工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护中国人民正常营业、生活的起码要求，制止一部分日本浪人的肇事、捣乱；然而，淞沪警备司令部秉承国民党中央的意旨，向沪宁、沪杭两路沿线驻军及驻沪部队发出如下通令(一)加紧警备区域内防范,严令部队避免与日人冲突(二)严密保护日侨(三)深愿人民本爱国热忱，处以坚忍态度,勿作轨外行动,务使日人无所借口(四)严密防范反动分子乘机滋事。②

①《外交为无形之战争》,《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1961 年 7 月版。
②《警备部防范工作,集中警力维持治安》,《申报》,1931年 9月 22 日 。

这个通令是纵容一批捣乱肇事的日侨为所欲为，中国人要反抗一下，就是反动分子。日侨的破坏、骚扰是听之任之，还要保护；中国人则属于军队严密防范之列。这就是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基本政策。

“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变发生，在中国全国性的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坚决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领导人民展开抗日救国运动。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① 并指出“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②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又联合日本共产党中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共同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工农群众与日本工农群众的共同敌人。他们不但压迫与剥削日本本国的工农群众，而且也在压迫与剥削中国的工农群众。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次用暴力占据东三省，是日本帝国主义想把东三省完全变为日本殖民地的直接行动。”号召“中国与日本的劳苦群众联合起来”；“反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③ 中日两国共产党的共同宣言强调要加强两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团结，携起手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这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蒙事变发表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次继续未已侵略的残暴的军事行动，是日本帝国政府早经预谋的计划。号召中国各族人民要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①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 页。
② 同上书，第 7—8 页。
③ 《红旗周报》第 19 期，1931 年 10 月 18 日出版。

强占满蒙。①

中国共产党不只是表明对日本侵略我国东三省的态度，同时提出了任务。9月22日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规定得很明白：

“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② 具体的规定了几项工作：

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行动。丝毫地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的斗争上去，同时坚决地反对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向广大群众指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并且首次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要使这些武装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

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经过这些组织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出版反帝的日报，尤其在日本工厂进行组织反日的罢工、示威。注意学生中的工作。

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和加紧北满军队中的工作，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的打击。

开展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工作和灾民的工作。

此外有进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和拥护红军苏维埃的工作，改善地下党的秘密工作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天之内，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号召、宣言、决议，有哪些特点和作用呢？

一、在“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就明确地揭示了日本是要占领东三省，并且其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如果在以后

① 《红旗周报》第19期，1931年10月18日出版。
② 《九·一八”—”·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14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